

张海沙
■ 著

初盛唐佛教禅学
与诗歌研究

万叶文丛



学术书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万叶文丛
学术书系

张海沙 著

初盛唐佛教禅学 与诗歌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FF16/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初盛唐佛教禅学与诗歌研究/张海沙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1

(万叶文丛)

ISBN 7-5004-2882-0

I. 初… II. 张… III. ①禅宗-研究-中国-唐代 ②唐诗-文学研究 IV. ①B946.5 ②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3897 号

责任编辑 黄德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朱文苓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北方印刷厂 装 订 新兴装订厂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25 插 页 2

字 数 234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1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霍松林

禅属宗教，着眼于彼岸世界；诗属艺术，立足于此岸世界，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然而禅与诗都重视内心体验，重视妙悟、启示和象喻，追求言外之意，在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上有许多相通之处，可以双向渗透。因此，自禅宗在唐代确立以来，便与诗交融互补，结下不解之缘。禅师借诗明禅，诗人援禅入诗，元好问曾用两句诗概括，那便是：“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嵩和尚颂序》）倘要全面研究唐诗，展现唐诗的原貌及其发展规律，建构富有民族特色的诗学理论体系，则禅与诗的关系不仅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还可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长期以来，唐诗研究者鉴于“宗教是麻醉人民精神的鸦片”而对禅与诗的关系讳莫如深，当不得不提的时候，便用“受禅宗消极影响”一笔带过。改革开放以来，情况逐渐改变；近几年，“禅与文学”、“禅与诗”，已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从已发表的论著看，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宏观的审视，如《唐代文学与佛教》等；二是微观的考察，如《王维诗歌与禅》等。至于从发展史的角度纵论一代诗歌与禅学关系的著作，则尚付阙如。从这一意义上说，张海沙君的论著《初盛唐佛教禅学与诗歌研究》带有开创性质，值得重视。

海沙治学勤奋，学风谨严，从充分掌握资料、了解研究对象入手，研读了大量佛教典籍、唐人诗文总集、别集以及与此相关

的历史文献，认识到有唐一代，佛教禅学与中国诗歌创作都经历了一个发展、成熟、兴盛和衍变的历史阶段，而二者的发展、成熟、兴盛和衍变，又大致同步，从而以此为根据，分四期论述，体现了历史真实与逻辑真实的统一。

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其中国化的过程，便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诗文化的吸收、融合过程；而唐代诗人对禅学的接受，也建立在自身传统文化修养和诗禅相通的内在机制之上。禅的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禅的诗化；唐代诗人接受禅学影响，则导致了在一定程度上诗的诗化。诗与禅互为参照系而双向渗透，表现了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不同质的文化的一种融合。基于这种认识，海沙在恰当分期之后，对每一时期的论述，都力图从诗歌创作的实际出发，结合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和诗人们对禅学的接受，多方面、多层次地揭示诗与禅的关系，从而展现了唐代诗风嬗变的某些规律和佛教中国化的某些规律。

禅对诗的影响，是通过诗人这个创作主体实现的。而诗人，其时代背景、文化素养、思想倾向、社会阅历、政治遭遇、升沉显晦，以及所到之处的禅宗派别等等，都互不相同，故对禅学的接受也千差万别。海沙通过对有关资料的充分占有和细致辨析，从众多诗人的论述中体现了唐诗禅化的复杂过程和文化内涵。例如论王绩，海沙指出：王绩儒、道思想俱深，其在初唐的归隐并非逃避现实，向往彼岸，而是处于治世的率性自适。王绩受《金刚经》影响较大，其禅观是遣视听、祛尘累，以识知真如本体。当他把握景物的禅韵并融合禅理进行诗歌创作时，便创造出情景交融、物我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王绩的诗歌，标志着中国诗歌开始了意境的追求。又如论张说，海沙通过张说的仕途升沉和禅学影响的具体描述，展示其文学观和诗歌创作的转变过程，指出：本来重视音律、词采的张说由于受禅宗空观与定慧理论的影响，转而追求淳真、朴素的美学境界，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和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艺术观都有启迪作用。对于以

道家思想为主导、号称“诗仙”的李白和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号称“诗圣”的杜甫接受禅学思想的考查、论析，尤鞭辟入里。李白学禅是作为道家思想的补充，禅学智慧给李白一份沉静、洒脱的心境，而禅宗对个性的高扬，又强化了李白豪迈、狂放的浪漫主义心性。至于杜甫，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受禅宗不同派别的影响，且有入禅之作；但他自始至终立足现实、坚持儒家理想，只是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无法克服、思想上的重压无法忍受时才借禅境以求精神上的超脱。对于其他许多重要诗人如宋之问、王昌龄、孟浩然、王维等接受禅学思想及对诗歌创作影响的考查、论析，也同样细致入微，新意迭出，引人入胜。

关于禅学对唐诗的影响，海沙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估。一方面，她阐明了唐代诗人对禅学思想的接受，在诗歌创作的意境追求和诗歌理论的意境探讨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对思维方式、艺术表现方式也有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她又指出：即使在禅学盛行的时期，仍有大量未受禅学影响的优秀之作；而许多禅趣盎然的诗，既有某些优点，又有局限性。她认为：以佛家思想为主导、号称“诗佛”的王维，其最高的审美范畴是空和静。《鹿柴》、《汉江临泛》、《鸟鸣涧》、《青溪》一类的诗，代表了以禅学为主导的诗歌创作所达到的最高境界。然而淡漠世事、随顺自安的处世态度和空静的审美观，可以使他写出一幅幅空寂小景，而早年内容深厚、感情热烈、气势磅礴、足以体现盛唐气象的诗作，便逐渐销声匿迹，不复可见。

禅对诗的影响，涉及创作与理论两个方面，即所谓“以禅入诗”和“以禅喻诗”。海沙的这部著作主要着眼于禅对唐代诗歌创作的渗透，即“以禅入诗”，并由此谈到诗人在观照、欣赏、思维方式、表达方式、意境追求、艺术风格等方面所发生的种种变化；而在禅对诗歌理论的影响，即“以禅喻诗”方面，虽然也有论述，却未能充分展开。这未免有点美中不足。如果将“以禅入诗”与“以禅喻诗”更好地结合起来，则对诗禅关系的论述将

更其完美。

海沙专业基础扎实，知识领域广博，具有较好的独立从事教学和科研的能力。又才情富赡，能作意境优美的诗词，擅写清新明丽的散文，早有“三湘才女”之誉。我早年接受汪辟疆、陈匪石诸业师“知、能并重”的教诲，数十年来虽以教学、科研为主，但业余不废创作，从而体会到研究与创作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有了从事诗词散文创作的切身经验，则研读古代和今人的文艺作品，才能探骊得珠，而不至于隔靴搔痒。门人能按照我的要求既以教学、研究为主而又兼擅诗词散文创作者颇不乏人，海沙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希望她以这部学位论文为先导，开拓不息，奋进不已，为祖国和全人类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1994年炎夏写于唐音阁

前 言

本文力求以历史发展的眼光考察佛教禅学与初盛唐诗歌创作之关系。

有唐一代，佛教禅学与中国古代诗歌创作都经历了一个发展、成熟、兴盛、变化的历史阶段，这二者所经历的历程却并非是平行的。佛教传入中土，对中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审美方式等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以历史发展的眼光，考察佛教禅学的发展历程、考察诗歌创作的发展历程、考察诗与禅二者关系的历程，我们会获得更清晰的、更符合实际的对历史的认识，也能使我们逐渐深入地揭示诗禅关系发展的规律。而过去，尽管有不少探讨诗禅关系的论作，将二者关系置于发展变化的大背景的考察却是不多的。

各个历史时期诗禅关系的不同状态，取决于各个历史时期诗作者对佛教禅学的接受程度。佛教中的禅学与禅宗，并非是一个与佛教其他宗派不相融合的独立存在。禅，作为佛教六度波罗蜜（六种修行方式）之一，是佛教各派普遍奉持的一种修行方式。唐代以禅立宗的禅宗建立，南北二宗的领袖人物都广泛地吸取了佛教经典（如《楞伽经》、《涅槃经》、《法华经》、《金刚经》、《华严经》、《心经》等）的宗教思想与精神，而且，唐代佛教各宗亦有相融相摄的倾向。因此，诗人对禅学的接受，往往不会单单地接触与接受禅学与禅宗，他们会呈现出复杂的、兼融的接受

状态。

中土文人对佛教禅学的接受，又是建立在中土传统文化修养的基础之上。中土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等等，文化修养的基础侧重不同、涉入的深浅程度不同，再加上个人的性格秉赋、生活经历等的不同，也会使其对佛教禅学的接受表现出不同的态势。因此，我们只能以作家的作品及可靠的文献资料，作为我们的理论出发点，在对一定历史时期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实践整体的、本质的把握基础上，结合禅宗的形成与发展和文人对禅学思想的接受，揭示诗歌创作所表现出的这种过程的影响，力求做到历史的真实与逻辑真实的相结合。

根据有唐一代禅学之发展、诗风之演变，我们将整个唐代禅与诗关系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

1. 早期的禅学与初唐诗歌（武德元年至久视元年，即公元618年至700年）。从唐王朝建立至一代禅师神秀应诏入京奉为国师，这一阶段是禅宗的发展期，也是唐代诗歌创作的发展期。这一时期，人们在不同的区域、不同层次地与禅宗建立前的佛教禅学及初建立的禅宗发生着联系并接受着影响。这种影响对于诗歌创作的由初唐走向盛唐起到积极作用。本时期可分四个部分讨论：（1）野逸诗人与山林之禅；（2）京城诗人与寺院之禅；（3）宦游诗人的禅学影响及其诗作；（4）初唐僧人之诗作。

2. 南能北秀、神会时期的禅学与盛唐诗歌（久视元年后至宝应元年，即公元701年至762年）。自久视元年神秀奉诏入京至宝应元年神会卒，这段时期是禅宗的成熟阶段，也是唐诗创作的鼎盛时期。神秀入京尊为国师，禅宗几乎成为国教，开元年间神会北上，更将惠能的曹溪宗旨弘扬光大。神秀与惠能的禅学思想都已成体系并具有中国化的特点。盛唐时期，文人士子们自觉地接受禅学思想，更深地体悟禅理与禅境。儒释道并重的有唐一代，积极用世的或隐逸出世的诗人、以儒家思想或道家思想为主导的诗人，往往都有对佛教禅学的接受。在盛唐诗人或飘逸、或

沉静、或雄浑、或冲淡的诗篇中，我们往往能领略到佛教禅学的作用。本时期分为五部分讨论：（1）初盛唐的过渡诗人与禅学的影响；（2）山水田园诗派及边塞诗人的创作与禅学影响；（3）以道家思想为主导的李白和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杜甫对禅学思想的接受及其诗歌；（4）王维的佛教禅学思想及其诗歌；（5）盛唐僧人之诗作。

3. 曹溪禅的弘化开展与中唐诗歌（宝应元年后至“会昌法难”，即公元763年至841年）。这段时期中国佛教进入以禅宗为主的时代，“天下言禅者，皆本曹溪。”曹溪禅的弘化开展过程中，出现各种不同家风。禅风变化，诗风亦在变化求新。“大历十才子”虚静的诗风与禅境、白居易浅易的诗风与禅净合一的倾向、柳宗元峻峭的诗风与禅教合一的倾向，都有着内在的联系。

4. 禅宗各宗派的门风与晚唐诗歌。唐武宗“会昌法难”前后，禅宗进入了分门立派时期，至唐末形成五个影响较大的支派（其中法眼宗形成较晚，为五代时）。五派的基本思想都属于禅宗南宗，然而由门庭设施的不同，接引徒众的方式不同，形成不同门风。晚唐时期，禅的虚无与诗的感伤、禅的狂放与诗的香艳、禅的机锋与诗的委婉，有着相同的背景和构成机制。

本书所要讨论的是初盛唐时期的佛教禅学与诗歌创作。作者想以禅的发展成熟和诗歌创作的发展以至鼎盛的这段时期，来考察诗与禅关系的深入发展，以图揭示佛教禅学对唐代诗歌艺术特征形成的作用，揭示禅与诗相互关系的普遍规律。

禅与诗相互的影响，这是历史的客观现象，它具有逻辑的必然性。讨论禅与诗的关系，实际上便是考察宗教与艺术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意识形态各领域的考察表明，宗教与艺术在把握世界的方式上，颇为接近。南宋严羽以禅喻诗，他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理论立足点：“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①

① 《沧浪诗话·诗辨》。

以妙悟概括禅道与诗道的共同点，它揭示了佛教禅宗开悟的心理机制与诗人审美意识发生的相似：妙悟的对象往往是形象的客体、妙悟的内容是情感与理智、具象与抽象、潜意识与显意识等相结合的综合体，而在整个心理过程中，常有直觉、联想、想象、幻觉等心理现象的出现。禅与诗之间产生关系的另一必然趋势是在表达阶段禅的诗化和诗的禅化。禅宗提倡“不立文字”，讲究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但禅悟后的心地又往往须借助文字表达，师徒之间的勘问、接引也往往要借助于语言。不立文字而又不离文字，禅师选择了精炼、形象的语言形式，惠能和神秀的偈句都像是一首小诗。禅的诗化也促进了诗的禅化。中国古典诗歌创作对意境的自觉追求和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对意境的议论，与佛教禅学思想有渊源关系。

佛教禅学对中国古代诗歌形成自己的特征和特有的艺术魅力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在近体诗中，以短小的篇幅表现情景交融的意境，尤见其影响。然对这种作用与影响的评估，须持一种客观的态度。首先须指出的是，即使在禅宗盛行的时期，仍有许多未经禅学思想陶冶的优秀之作。其次，宗教与艺术，禅与诗，毕竟有着不同的旨趣。从本体论而言，对诗人的激情，对诗歌艺术，禅是否定和排斥的。因而入禅极深者，其诗歌创作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

也正是在这种积极与消极影响并存消长的状态下，我们结合禅的中国化历程，讨论禅与诗关系的一段历史，这对于揭示唐代诗风嬗变的规律将有裨益，甚而冀望于对宗教与艺术关系问题的讨论，有促进作用。



录

序	霍松林 (1)
前言	(1)
第一章 早期的禅学与初唐诗歌	(5)
第一节 野逸诗人与山林之禅	(6)
一、野逸诗人之界定及其与禅之关系	(6)
二、王绩的仕隐经历及其所受之禅学影响	(8)
三、王绩之诗作及其与谢灵运诗歌之比较	(15)
第二节 京城诗人与寺院之禅	(21)
一、京城诗人之界定及其与禅之关系	(21)
二、以唐太宗为首的京城诗人其诗歌中禅学 思想的表现	(30)
第三节 初唐宦游诗人的禅诗	(37)
一、宦游诗人的界定及其思想性格特征	(37)
二、宦游诗人对佛教禅学的接受	(44)
三、宦游诗人佛教禅学影响之诗歌表现	(48)
第四节 初唐僧人之诗作	(58)
一、唐以前僧诗略述	(58)
二、唐代僧诗之蒐集	(69)
三、初唐僧诗分类	(72)

四、王梵志的身世及诗歌“翻著袜”法	(80)
第二章 南能北秀、神会时期的禅学与盛唐诗歌	(95)
第一节 初盛唐的过渡诗人与禅学的关系	(96)
一、宋之问对禅学思想的接受及其诗风的转变	(98)
二、张说的禅学思想及其诗歌	(106)
第二节 山水田园诗人及边塞诗人的禅学影响 及其创作	(118)
一、孟浩然诗歌的禅学影响	(120)
二、王昌龄与岑参的诗歌意象与禅学影响	(130)
三、储光羲对禅学思想的接受及其田家诗	(151)
第三节 李白杜甫对佛教禅学思想的接受及其诗歌	(164)
一、李白对佛教禅学的接受及诗作的表现	(166)
二、杜甫对禅学的接受及其诗歌	(186)
第四节 王维的佛教禅学思想及其诗歌	(206)
一、王维的佛教禅学思想	(206)
二、王维诗歌的意境	(217)
三、从王维诗风的转变论佛教禅学对诗歌创作的 消极影响	(230)
第五节 盛唐僧人之诗作	(249)
一、盛唐僧诗之概况	(249)
二、寒山子思想经历及诗歌	(262)
主要参考书目	(281)
后记	(284)

前 言

本文力求以历史发展的眼光考察佛教禅学与初盛唐诗歌创作之关系。

有唐一代，佛教禅学与中国古代诗歌创作都经历了一个发展、成熟、兴盛、变化的历史阶段，这二者所经历的历程却并非平行的。佛教传入中土，对中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审美方式等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以历史发展的眼光，考察佛教禅学的发展历程、考察诗歌创作的发展历程、考察诗与禅二者关系的历程，我们会获得更清晰的、更符合实际的对历史的认识，也能使我们逐渐深入地揭示诗禅关系发展的规律。而过去，尽管有不少探讨诗禅关系的论作，将二者关系置于发展变化的大背景的考察却是不多的。

各个历史时期诗禅关系的不同状态，取决于各个历史时期诗作者对佛教禅学的接受程度。佛教中的禅学与禅宗，并非是一个与佛教其他宗派不相融合的独立存在。禅，作为佛教六度波罗蜜（六种修行方式）之一，是佛教各派普遍奉持的一种修行方式。唐代以禅立宗的禅宗建立，南北二宗的领袖人物都广泛地吸取了佛教经典（如《楞伽经》、《涅槃经》、《法华经》、《金刚经》、《华严经》、《心经》等）的宗教思想与精神，而且，唐代佛教各宗亦有相融相摄的倾向。因此，诗人对禅学的接受，往往不会单独地接触与接受禅学与禅宗，他们会呈现出复杂的、兼融的接受

状态。

中土文人对佛教禅学的接受，又是建立在中土传统文化修养的基础之上。中土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等等，文化修养的基础侧重不同、涉入的深浅程度不同，再加上个人的性格秉赋、生活经历等的不同，也会使其对佛教禅学的接受表现出不同的态势。因此，我们只能以作家的作品及可靠的文献资料，作为我们的理论出发点，在对一定历史时期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实践整体的、本质的把握基础上，结合禅宗的形成与发展和文人对禅学思想的接受，揭示诗歌创作所表现出的这种过程的影响，力求做到历史的真实与逻辑真实的相结合。

根据有唐一代禅学之发展、诗风之演变，我们将整个唐代禅与诗关系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

1. 早期的禅学与初唐诗歌（武德元年至久视元年，即公元618年至700年）。从唐王朝建立至一代禅师神秀应诏入京奉为国师，这一阶段是禅宗的发展期，也是唐代诗歌创作的发展期。这一时期，人们在不同的区域、不同层次地与禅宗建立前的佛教禅学及初建立的禅宗发生着联系并接受着影响。这种影响对于诗歌创作的由初唐走向盛唐起到积极作用。本时期可分四个部分讨论：（1）野逸诗人与山林之禅；（2）京城诗人与寺院之禅；（3）宦游诗人的禅学影响及其诗作；（4）初唐僧人之诗作。

2. 南能北秀、神会时期的禅学与盛唐诗歌（久视元年后至宝应元年，即公元701年至762年）。自久视元年神秀奉诏入京至宝应元年神会卒，这段时期是禅宗的成熟阶段，也是唐诗创作的鼎盛时期。神秀入京尊为国师，禅宗几乎成为国教，开元年间神会北上，更将惠能的曹溪宗旨弘扬光大。神秀与惠能的禅学思想都已成体系并具有中国化的特点。盛唐时期，文人士子们自觉地接受禅学思想，更深地体悟禅理与禅境。儒释道并重的有唐一代，积极用世的或隐逸出世的诗人、以儒家思想或道家思想为主导的诗人，往往都有对佛教禅学的接受。在盛唐诗人或飘逸、或

沉静、或雄浑、或冲淡的诗篇中，我们往往能领略到佛教禅学的作用。本时期分为五部分讨论：（1）初盛唐的过渡诗人与禅学的影响；（2）山水田园诗派及边塞诗人的创作与禅学影响；（3）以道家思想为主导的李白和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杜甫对禅学思想的接受及其诗歌；（4）王维的佛教禅学思想及其诗歌；（5）盛唐僧人之诗作。

3. 曹溪禅的弘化开展与中唐诗歌（宝应元年后至“会昌法难”，即公元763年至841年）。这段时期中国佛教进入以禅宗为主的时期，“天下言禅者，皆本曹溪。”曹溪禅的弘化开展过程中，出现各种不同家风。禅风变化，诗风亦在变化求新。“大历十才子”虚静的诗风与禅境、白居易浅易的诗风与禅净合一的倾向、柳宗元峻峭的诗风与禅教合一的倾向，都有着内在的联系。

4. 禅宗各宗派的门风与晚唐诗歌。唐武宗“会昌法难”前后，禅宗进入了分门立派时期，至唐末形成五个影响较大的支派（其中法眼宗形成较晚，为五代时）。五派的基本思想都属于禅宗南宗，然而由门庭设施的不同，接引徒众的方式不同，形成不同门风。晚唐时期，禅的虚无与诗的感伤、禅的狂放与诗的香艳、禅的机锋与诗的委婉，有着相同的背景和构成机制。

本书所要讨论的是初盛唐时期的佛教禅学与诗歌创作。作者想以禅的发展成熟和诗歌创作的发展以至鼎盛的这段时期，来考察诗与禅关系的深入发展，以图揭示佛教禅学对唐代诗歌艺术特征形成的作用，揭示禅与诗相互关系的普遍规律。

禅与诗相互的影响，这是历史的客观现象，它具有逻辑的必然性。讨论禅与诗的关系，实际上便是考察宗教与艺术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意识形态各领域的考察表明，宗教与艺术在把握世界的方式上，颇为接近。南宋严羽以禅喻诗，他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理论立足点：“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①

① 《沧浪诗话·诗辨》。

以妙悟概括禅道与诗道的共同点，它揭示了佛教禅宗开悟的心理机制与诗人审美意识发生的相似：妙悟的对象往往是形象的客体、妙悟的内容是情感与理智、具象与抽象、潜意识与显意识等相结合的综合体，而在整个心理过程中，常有直觉、联想、想象、幻觉等心理现象的出现。禅与诗之间产生关系的另一必然趋势是在表达阶段禅的诗化和诗的禅化。禅宗提倡“不立文字”，讲究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但禅悟后的心地又往往须借助文字表达，师徒之间的勘问、接引也往往要借助于语言。不立文字而又不离文字，禅师选择了精炼、形象的语言形式，惠能和神秀的偈句都像是一首小诗。禅的诗化也促进了诗的禅化。中国古典诗歌创作对意境的自觉追求和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对意境的议论，与佛教禅学思想有渊源关系。

佛教禅学对中国古代诗歌形成自己的特征和特有的艺术魅力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在近体诗中，以短小的篇幅表现情景交融的意境，尤见其影响。然对这种作用与影响的评估，须持一种客观的态度。首先须指出的是，即使在禅宗盛行的时期，仍有许多未经禅学思想陶冶的优秀之作。其次，宗教与艺术，禅与诗，毕竟有着不同的旨趣。从本体论而言，对诗人的激情，对诗歌艺术，禅是否定和排斥的。因而入禅极深者，其诗歌创作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

也正是在这种积极与消极影响并存消长的状态下，我们结合禅的中国化历程，讨论禅与诗关系的一段历史，这对于揭示唐代诗风嬗变的规律将有裨益，甚而冀望于对宗教与艺术关系问题的讨论，有促进作用。